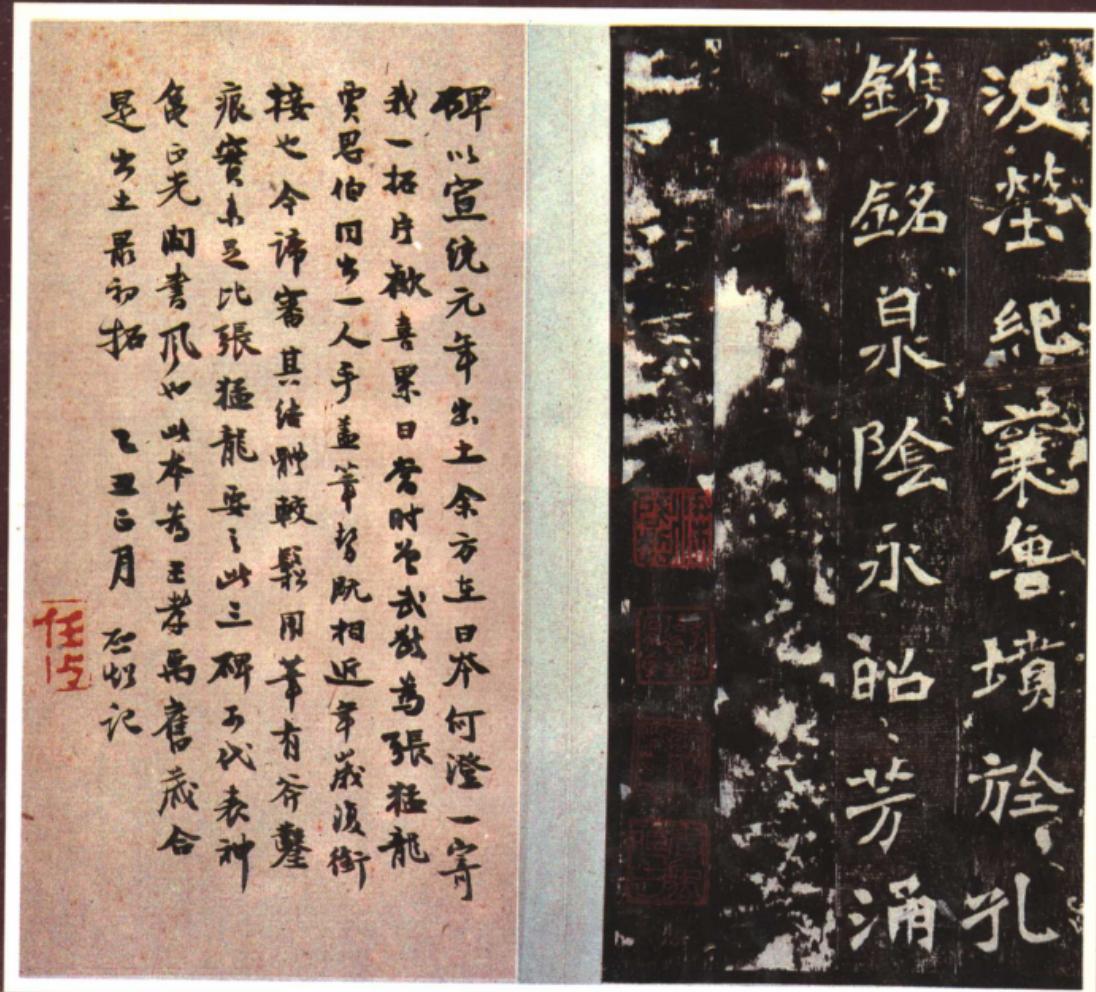


# 梁啟超題跋墨蹟書法集

LIANGQICHAOTIBAMOJISHUFAJI

北 京 圖 書 館 藏



榮寶齋出版社



ISBN 7-5003-0298-3

9 787500 302988 >

I S B N 7—5003—0298—3 / J · 299

定價：66 圓

冀亞平 賈雙喜 等編

梁啟超題跋墨蹟書法集

榮寶齋出版社

(京)新登字 019 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梁启超题跋墨迹书法集 / 冀亚平等编. — 北京: 荣宝斋出版社, 1995

ISBN 7-5003-0298-3

I. 梁… II. 冀… III. 汉字 - 书法 - 真迹 - 中国 - 近代 IV.J29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5)第02532号

**梁啓超題跋墨蹟書法集**

冀亞平 賈雙喜 等編

---

出版發行: 荣寶齋出版社(北京宣武區西琉璃廠)

經 銷: 新華書店總店北京發行所

排 版: 北京市信息管理學校

制版印刷: 人民美術印刷厂

---

開 本: 850×1168 1/16 印張: 18

1995年3月北京第一版 1995年3月第一次印刷

ISBN7-5003-0298-3 / J.299

---

定價: 66.00 圓(精)



# 石門銘筆意多與石門頌相近彼

以草作隸此以草作楷皆逸品也吾鄉  
鄧鐵香鴻臚一生專學石門銘茲將  
未得其瓢逸南海先生早年二益  
此外時流或有學者乃怪鄙不可獨  
述天下有只許賞翫不許學者太白  
之詩与此碑皆其類也碑本摩崖也

少<sup>不易</sup>佳拓此拓有劉燕庭歲印即此已  
為佳矣

乙丑正月十九日啓超跋歲

石門銘跋



孔彪碑跋

漢  
古  
博  
南  
君  
府  
亦  
隣  
碑  
刻

岱  
超  
補  
領



孔彪碑跋

時珍志光緒七年秋立諸城西古農鄉出土  
於村志有銘有諸城尹氏題識一行又於東二行  
字二枚末鑿尹乃鼎文未一印此奉手之蓋初出土拓  
也

乙丑正月  
烈如後



飲冰室藏

新刻神頰魯會道勤拓公碑禮書本土



顏勤禮碑跋

# 目錄

梁啓超的拓本收藏、題跋及書法	劉濤	一
梁氏藏刻石拓本敘錄	冀亞平等	一九三
書法指導	梁啓超	二四二
梁啓超生平簡表	劉濤	二四九
梁啓超藏金石拓本目錄	冀亞平等	二五四
一 泰山刻石殘字跋	一一	
二 群臣上壽刻石跋	一二	
三 甘泉山刻石殘字跋	一二	
四 廉孝禹刻石跋	一三	
五 朱博殘碑跋	一四	
六 萊子侯刻石跋	一四	
七 唐公房碑跋	一五	
八 三老諱字忌日記跋	一六	
九 昆弟六人買地記跋	一七	
一〇 陽三老石堂畫像題字跋	一八	
一一 祀三公山碑跋	一九	
一二 延光殘碑跋	二〇	

一 裴岑紀功碑跋	二三
二 景君碑跋	二五
三 文叔陽食堂畫像題字跋	二六
四 武斑祠畫像銘跋	二八
五 永壽元年殘石跋	三〇
六 李禹通閣道摩崖跋	三一
七 劉平國碑跋	三二
八 張壽殘碑跋	三三
九 陳德殘碑跋	三四
一〇 西狹頌跋	三四
一一 孔彪碑跋	三五
一二 鄭閣頌跋	三六
一二 顏淮表紀跋	三七
一四 楊淮表紀跋	三八
一五 劉梁碑殘石跋	三九
一六 曹全碑跋	四〇
一七 張遷碑跋	四一
一八 鄭季宣殘碑陰跋	四二
一九 鄭季宣殘碑陽跋	四五
二〇 吹角壩刻石跋	四五
二一 樊敏碑跋	四六
二二	四七

三二	石牆村刻石跋	四八
三三	元孫等字殘石跋	四九
三四	君車畫像跋	五〇
三五	正直等字殘石跋	五一
三六	魯相謁孔廟殘碑跋	五二
三七	李苞通閣道題記跋	五三
三八	潘宗伯等造橋格題字跋	五四
三九	天發神識碑殘字跋	五六
四〇	孫氏碑跋	五七
四一	呂望表跋	五六
四二	鄧艾祠堂碑跋	五九
四三	劉懷民墓志跋	六〇
四四	瘞鶴銘跋	六一
四五	蕭愴碑跋	六二
四六	周哲墓志跋	六三
四七	元景造像記跋	六四
四八	韓顯宗墓志跋	六五
四九	寇臻墓志跋	六六
五〇	元繼次妃石婉墓志跋	六七
五一	石門銘跋	六九
五二	周千記墓志跋	七〇
五三	惠猛墓志跋	七一
五四	元演墓志跋	七二
五五	拓跋濬嬪耿氏墓志跋	七三
五六	皇甫驥墓志跋	七四
五七	元萇溫泉頌跋	七五
五八	元彥墓志跋	七六
五九	楊胤墓志跋	七七
五六	寇憑墓志跋	六〇
五六	李壁墓志跋	六一
五六	俞玄墓志跋	六二
五六	元恪貴嬪司馬顯姿墓志跋	六三
五六	鄭道忠墓志跋	六四
五六	樊可僖造像跋	六五
五六	馬鳴寺根法師碑跋	六六
五六	元倪墓志跋	六七
五六	高貞碑跋	六八
五六	鞠彥雲墓志跋	六九
五六	孫遼浮屠銘記跋	七〇
五六	李超墓志跋	七一
五六	孫遼墓志跋	七二
五六	李謀墓志跋	七三
五六	劉玉墓志跋	七四
五六	元欽墓志跋	七五
五六	元景略妻蘭將墓志跋	七六
五六	王僧墓志跋	七七
五六	張滿墓志跋	七八

七九	李憲墓志跋	一二〇
八〇	高湛墓志跋	一二一
八一	高翻碑跋	一二二
八二	劉懿墓志跋	一二三
八三	蔡俊墓碑跋	一二四
八四	元湛妃王令媛墓志跋	一二六
八五	元顯墓志跋	一二七
八六	元凝妃陸順華墓志跋	一二九
八七	崔頡墓志跋	一二九
八八	法慤塔銘跋	一三〇
八九	高肱墓志跋	一三一
九〇	朱岱林墓志跋	一三三
九一	劉忻墓志跋	一三五
九二	鄭子尚墓志跋	一三四
九三	文殊般若經碑跋	一三六
九四	強獨樂造像碑跋	一三八
九五	時珍墓志跋	一四〇
九六	張景略墓志跋	一四一
九七	鞏賓墓志跋	一四二
九八	董美人墓志跋	一四三
九九	張通妻陶貴墓志跋	一四六
一〇〇	孟顯達碑跋	一四七
一〇一	王善來墓志跋	一四五
一〇二	張盈墓志跋	一五〇
一一〇	尉富娘墓志跋	一〇三
一一一	元智墓志	一〇四
一一二	元智妻姬氏墓志跋	一〇五
一一三	姚辯墓志跋	一〇六
一一四	竇梁經刻石跋	一〇七
一一五	孔子廟堂碑跋	一〇八
一一六	段儼妻李氏墓志跋	一〇九
一一七	司馬遷妾隨清娛墓志跋	一一〇
一一八	房玄齡碑跋	一一一
一一九	聖教序跋	一一二
一一〇	道因法師碑跋	一一三
一一一	同州聖教序記跋	一一四
一一二	張元隱碑跋	一一五
一一三	李勣碑跋	一一六
一一四	劉仁墓志跋	一一七
一一五	顏真卿等謁金天王祠題記跋	一一八
一一六	爭座位帖跋	一一九
一一七	李含光碑跋	一一〇
一一八	顏勤禮碑跋	一一一
一一九	顯密圓通建舍利塔跋	一一二
一一〇	蘭亭序跋	一一三
一一一	阮元畫像跋	一一四
一一二	百漢碑硯集拓跋	一一五

# 梁啟超的拓本收藏、題跋及書法

劉濤

清季民初的中國，大事迭起：百日維新、戊戌政變、辛亥革命、倒袁起義、張勛復辟、五四運動、五卅慘案……，每有事件發生，都能看到梁啟超投身其中的身影，或者擔着責任、帶着感情的政論，他與社會與時事總是保持着發自「內熱」的關懷。

每當社會急劇變革之際，必然把參與其中的人群分離成利益各不相同、政治行為對立的營壘或派別。在清朝末年社會大變局背景之下，人們常以新舊定人物，對於梁啟超這位複雜的人物，認真想來，很難以新舊給他一個定位。他宣傳「新學」<sup>①</sup>，守舊勢力認定他是「新黨」，而革命者並不接納他，視之為「保皇黨」。連力倡變法維新的康有為也不曾落入這樣尷尬的境地。恩怨盡銷的今天，我們再來面對梁啟超時，便發現，他不僅是一位在當時的政壇和學界雙雙獲得極大聲譽，極有影響力的風雲人物，其思想理念也大大超越了同輩的許多政治家，至今仍未失去思想的光澤。於是，他的派別屬性，似乎不怎麼重要了。

梁啟超，字卓如，號任公，別署飲冰室主人<sup>②</sup>。一八七三年生於廣東省新會縣熊子鄉，一九二九年在北京協和醫院病逝。他進退沉浮的一生，大體可以分為問政與述學兩個階段。以他旅歐回國的一九二〇年——梁氏四十八歲——為分水嶺，此前的梁啟超，是政治家的梁啟超，追隨業

師康有為上書光緒皇帝，奔走於京滬等地組織強學會<sup>③</sup>，主編《時務報》，又應湖南巡撫陳寶箴之邀，赴湘主持時務學堂，培養維新人才。致力於掀起強大的變法維新聲浪的同時，梁啟超也由此成為與康有為齊名的著名變法人物。他二十六歲時，受到光緒皇帝召見，賞六品銜，負責京師大學堂、譯書局事務。政變之後，梁啟超避難日本，先後創辦《清議報》、《新民叢報》、《國風報》、《政論》雜志，大力宣揚君主立憲，鼓吹改良，更與主張「排滿革命」的反清志士展開筆戰<sup>④</sup>。共和之後，他擁戴與清政府有淵源關係的北洋軍閥首領袁世凱，出任熊希齡「人才內閣」的司法總長。當袁氏以帝制自為，他勸說無效之後，毅然與當年時務學堂的學生蔡鍔策劃反袁護國起義，出任兩廣護國軍軍務院政務委員長。以後還出任過段祺瑞執政府的財政總長。

北洋政府時期，政界寡頭是用槍來說話，梁啟超這樣的政界名流不過是他們裝點門面的擺設。梁啟超終於因為自己提出的行政舉措無從實施而脫離政界，赴歐旅行，回國後便把精力轉嚮了學術。作為學者的梁啟超，先後在清華、南開等學府從事教育與研究工作，自一九二五年起，與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同任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導師，又曾任北平圖書館館長等職。他的許多重要的學術著作，如《清代學術概論》

(1920)、《中國歷史研究法》(1921)、《先秦政治思想史》(1922)、《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1923)、《中國文化史》(1926)，都是在他生命的最後十年裏寫成的。

## 一 拓本的收藏

梁啓超曾經身心以之的政治活動，在他晚年的學術生涯中退居次要的地位，但他並沒有忘情國民忘懷政治，時常以學者的社會良心、良知自任，發表政論，發表演講，批評政治弊端，抨擊社會惡行，他想「做個學者生涯的政論家」。他解剖自己說：「我的學問興味政治興味都甚濃，兩樣比較，學問興味更為濃些。」政治家、政論家、學者，這就是梁啓超垂名青史的社會角色。缺少其中任何一個角色，梁啓超在近、現代史上份量就沒有那麼沉重。

梁啓超還有一個在他看來不值一提卻又讓他傾注過不少精力的私心愛好，即本文要談論的內容，那就是收藏碑刻拓本，而且時作跋語，用心題寫。比起經世的政務，學術的撰述，用舊日文人通常的話說，這不過是餘事。餘事者，末事、閑事也。自古以來，士大夫文人的生活少不了用這類餘事來調劑，尤其是清朝乾嘉以來，收藏金石拓本，題跋並轉相贈售，在文人官僚圈中蔚為風氣。展卷摩挲，舊拓墨光，善本神采，寓目賞心。怡養情性之外，又可增長鑒別真偽、欣賞書藝的眼識。在飲冰室里讀碑，俯案題跋，也是梁啓超生活里的一大樂趣，一種休憩的方式。題有跋語者達一百餘件，有的拓本他是再三題寫過跋語。

梁啓超收藏的拓本，在他逝世後家人盡數捐獻給北京圖書館。其中，題有跋語者達一百餘件，有的拓本他是再三題寫過跋語。

梁啓超的這桩業餘嗜好，為我們留下了一筆書法的財富。這要感謝梁氏家人的無私，使其不致散佚。同時也為我們今天研究梁啓超學者生涯的藝術活動的種種情狀提供了諸多方便。

梁啓超的碑刻題跋大部分已經刊入他的文集，這次結集出版的是題跋的手迹，因此，它的價值不啻供人們據題跋文本的內容察其收藏的來源、交游的人物、書法的觀念諸端，更便於以感官直接享受其書法的美感，知其嬗變的軌跡。

收藏歷代碑刻拓本，在梁啓超生活的那個時代，是許多稍有財力的文人樂而為之的「文化行為」。如果由宋朝歐陽修、趙明誠算起，這種風尚已經流行了九百餘年。清朝以來藏家之間遞相易售的拓本，有稀世珍品的宋拓，明朝的善本舊拓，更有清朝以來相繼出土的初拓。

梁啓超收藏的拓本，上乘者為明拓和乾隆時拓本，據《北京圖書館藏石刻敘錄》一書的著錄<sup>⑤</sup>，明拓有明韓逢禧及清查浦、馮浩、陳繼昌遞

藏的《樊敏碑》，王懿榮舊藏的《李勣碑》，顏氏家廟碑》，乾隆時拓本有張榮光舊藏《武班碑》，黃小松舊藏《張遷碑》和《孫夫人碑》，何昆玉舊藏《呂望表》，《刁遵墓志》。梁氏認為自藏的《謁金天王祠題名》乃「明拓」，《西狹頌》「當是乾隆前本」，《鄼闕頌》是「乾隆初年物」，《鄭季宣碑陰》是「乾隆升碑前舊拓」，等等。而梁啓超的多數藏品是嘉慶、道光時的拓本以及清中期以至民初時新出土碑志造像的初拓本。

梁啓超的藏品來源，大體通過以下兩種渠道。一是友人贈送。有三種情形：直接贈送者，《俞玄墓志跋》：「此石出端（方）家，遂入吾友貴築姚茫父華之手，茫父嘗手拓一紙見贈。」《元景造像殘石跋》：「周君養庵筆祥所贈。辛酉（1921年）春夏間養庵在奉天義州城西北十三里大凌河濱訪得者也。」當時周養庵訪得的遼刻石還有《韓貞造像殘刻》、《顯密圓通建舍利塔銘》。寄贈者，《勤禮碑跋》：「碑以民國十一年（1922）出土，今在陝西節署，此本為劉雪亞督軍鎮華所寄贈。」《劉仁墓志跋》：「石今在太原圖書博物館，曾望生遜以此初拓見寄。」外出游歷時所受餽贈者，如《瘞鵠銘》拓本就是梁氏遊焦山寺時寺僧鵠洲贈送的近拓。二是從藏家（或帖賣）那里購得，見於題跋記載較多的是銅梁王瓘（孝禹），《李謀墓志》、《鞠彥雲墓志》、《朱岱林墓志》、《尉富娘墓志》、《劉

懿墓志》等都是王氏售藏本，估計王氏向梁啓超轉售了不少的藏品。題跋中還提到龐芝閣、牛金波等輩。

有時爲了購置某一拓本，梁啓超要破費一些財力，顏真卿《爭座位帖》的人藏就是一例。梁啓超說自己「平生獨嗜顏書，顧獨不喜《爭座位帖》」，「但他最終「不惜重價收之」卻是因爲此拓爲「鄉先達所嘗珍襲」——該帖曾爲程瑤田、吳榮光遞藏，吳榮光是廣東南海人，《爭座位帖》原是吳氏筠清館中舊物。梁啓超人藏的吳榮光筠清館舊藏還有《武氏祠石闕銘》、《曹全碑》、《天發神識碑》等，大概也是出於「鄉先達所嘗珍襲」的心態，也許筠清館舊物的名聲大且好，比較可靠。

而藏家共有的心態，首先是看重稀有的舊拓，自然是「厚古薄今」，越古越好，遞藏有序的收藏名家的題跋越多越可靠，收藏也就成了崇拜的自我訓練。財力不夠，則捨而求其次，依循碑刻的知名度而取其佳拓。有的藏家本人即書家，又有據自己的書法偏好來選擇拓本人藏。這三種心態，從梁啓超的題跋來看，似乎都具有。

對於碑帖拓本，梁啓超大概是買進而不賣出，不象有些藏家兼有射利的欲望。他所購進的拓本，許多是知名藏家的藏品，除陳簠齋、朱竹垞、翁方綱、端匱齋、王瓘之外，還收藏有《三老忌日記》原石藏主餘姚周清泉的手拓本，《庶孝禹刻石》藏主李山農藏拓，《文叔陽食堂記》原石得主魚臺馬星恒藏本，王懿榮手拓並題記的《俞玄墓志》，陸劭聞於《元智墓志》初出土時精拓的自藏本，還有得之於邊陲軍將所藏的《劉平國紀功摩崖》初拓本。他在顏真卿《謁金天王祠》的跋語中就表示出對收藏名家藏品的信任。從知名藏家那裏購進藏品，當然少了許多風險，若行家千慮一失，審之不詳，也會發生隨人而誤的情況，偽品贗鼎的《董美人墓志》、《真庵記》、《周哲墓志》、《孫遼浮圖銘》的購進就是例子。比

如《周哲墓志》，梁氏在乙丑（1925年）正月二十日作跋時，已經發現志文所記年代上的疑點，還作了一些訂正，卻不曾懷疑爲偽作，越二日，經核方若《校碑隨筆》，才知道是偽刻。而無行的藏家以鄰爲壑，貪利的帖

賈有意造假，讓買家上當受騙，在那時是在所難免的了。

梁啓超是從甚麼時候開始留意收藏碑刻拓本的呢？這位學界巨子生前千萬字的著述中未置一辭，也許這等區區閑情的末事無關志業的宏旨，按古訓，還有「玩物喪志」的嫌疑。如果我們細心檢讀他的題跋手迹，便能發現蛛絲蠅迹般的線索。這里，不妨把他提到過收藏年代的幾則題跋按逆時的順序摘錄下來：

1917年（丁巳）。《文殊般若經碑跋》：「茲拓余以丁巳年得諸廣州」。  
1916年（丙辰）。《裴岑紀功碑跋》：「丙辰秋余在廣州，得舊拓漢碑十數種，此最可秘珍也」。又《呂望表跋》：「丙辰九月得自廣州」。

1915年（乙卯）。《瘞鶴銘跋》：「余以乙卯五月遊焦山獲此本，寶鶴洲最近拓成者」。

1909年（己酉，宣統元年）。《李壁墓志跋》：「碑以宣統元年出土，余方在日本，何澄一寄我一拓本，歡喜累日。」

以上抄引的跋語，拓本的收藏時間、地點都記載得十分明確，其行踪與梁氏年譜所記完全相符，應當是可信的。如果没有別的資料提出，就可以斷定，梁啓超留心碑刻拓本的收藏，保守地說，不會晚於1909年。這一年梁啓超三十七歲。我以爲，如果此前梁氏沒有收藏拓本的愛好，何澄一不會隔海寄贈拓本，他也不會因此「歡喜累日」。

藏家對於人藏的拓本，都有鈐印的習慣，以示己之所有。在後人，這是考察拓本遞藏經過和判定拓本年代、新舊的重要依據。梁啓超對藏品上的前人印章很注意，《庶孝禹刻石》、《劉平國紀功摩崖》、《李苞開通閻道記》上的前人鈐蓋的收藏印，他在題跋中都有說明。梁啓超也依例在藏品上鈐蓋他的印記，北京圖書館庋藏的梁氏舊藏，我無緣親見，就題有跋語的那一部分看，除《吹角礪摩崖》、《元孫等字殘石》、《鄧太尉祠》等少數幾件藏品的題記處未鈐印章外，一般都鈐一十三印不等，粗略統計，他先後鈐用的印章近五十枚，計有「任公四十五歲以後所作」、「任公五十以後手筆」、「飲冰室藏金文圖書」、「千石公慶壽之貝」、「壽如

金石」、「任公長壽」、「飲冰室藏」、「鍥而不舍」、「啓超籀讀」、「雙濤舊生」、「雙濤閣藏」、「雙濤閣」、「啓超無極」、「富貴吉祥」、「啓超私印」、「帖祖樓」、「慧業室」、「飲冰」、「任」等印；而「梁」字印有六方、「任公」印有六方、「新會梁氏」印有二方、「啓超」印有二方、「梁啓超印」有一方、「超」字印有一方、「飲冰室」印有一方、「新會梁啓超印」有一方。這些印章，1917年題跋時鈐用的達十四枚，1918年新見四枚，1923年又新見四枚。1925年則備見前述總數。

## 一一 題跋

梁啓超題有跋語的碑刻拓本，計一百二十餘種，上自秦朝的《泰山刻石》，下迄清人所刻阮元畫像，品類所及，有兩漢碑刻摩崖，魏晉碑版摩崖，南北朝碑志，隋唐碑志，還有少數宋以後的單刻法帖。而大宗是兩漢及北朝碑刻墓志，這是清朝藏家經營的重點所在，也是他們比之於宋元明藏家的優勢所在。

梁啓超題跋一般都署年款，由此知道他不是隨藏隨題，而是分別題於1917年（丁巳）、1918年（戊午）、1923年（癸亥）、1924年（甲子）、1925年（乙丑）、1927年（丁卯）、1928年（戊辰）。1917年題跋十一件，1918年七件，1923年四件，1924年一件，1925年八十二件，1927年二件，1928年一件。另有一些題跋未署年款。則最早的題跋見於1917年，集中於1925年（數量占所題拓本總數的64%），此後所題，寥寥數則，無復精力用心於此了。

1925年初寫下大量的題跋，有一個特殊的背景需要注意：1924年中秋，梁啓超的夫人李氏病故，不久，其子思成、思永赴美留學，梁啓超也隨之臥病床榻，孤零哀愁，情緒不振，當時的心情和境況，他在當年十二月三日寫給《晨報》紀念增刊的文章中傾訴備盡：「我今年受環境的

酷待，情緒十分無俚。我的夫人從燈節起，卧病半年，到中秋日奄然化去。……卒年以來，耳所觸的只有病人的呻吟，目所接的，只有女兒的涕淚。喪事初了，愛子遠行。中間還夾着群盜相噬，變亂如麻，風雪蔽天，生人道盡，塊然獨坐，幾不知人間何世。哎！哀樂之感，凡在有情，其誰能免！平日意態活潑，興會淋漓的我，這會也嗒然氣盡了。……我在病榻旁邊，這幾個月來拿甚麼事消遣呢？我桌子上和枕邊擺着一部汲古閣的《宋六十家詞》，一部王幼霞刻的《四印齋詞》，……除卻我的愛女之外，這些詞人便是我唯一的伴侶。我在無聊的時候，把他們的好句子，集句做對聯鬧着玩，久而久之，竟集成二三百副之多。……我做這類玩意兒，免不了孔夫子罵的「好行小慧」，但是「人生愁恨誰能免」，我在傷心時節尋些消遣，我想無論何人也該和我表點同情。」就在寫下這篇文章的次月，即1925年正月，繼集宋人詞句做對聯之後，梁啓超檢出自己藏的碑刻拓本作生活的陪伴，擇要題寫，大概同樣是為着消解喪妻引起的「傷心」，排遣孤寂造成的「無聊」。那麼，梁啓超的讀碑題跋，還不限於「怡悅」，也曾假它轉移悲傷的情緒，渡出情感生活的低谷。

說到梁氏作題跋的時間，似乎還有一個季節性的特點。我作了一個初步的統計，約75%的題跋寫於暮冬十二月和孟春正月——在北方，是冰凍三尺，寒風橫吹的季節。天寒地凍，又值歲杪年初，正多閑暇供其展讀拓本，題記作跋，寄托閑情。

### 梁啓超碑刻題跋的內容，涉及面比較寬泛，約有以下八類。

#### 一、敘碑刻的出土、發現的原委、藏所及去向

這類題跋，不少錄自前人金石舊籍，是藏家皆知的常識，借以推測藏品的捶拓年代。梁啓超藏品中有一部分是當時訪得的刻石初拓本，訪得者告以原委，梁啓超在跋語中有認真的記載，如《元景造像記》等遼石訪得的情況。又《文叔陽食堂畫像題字》原石，清方若《校碑隨筆》僅記：「舊在山東魚臺」，「歸長白托活洛氏。」今人王壯弘《增補校碑隨筆》的補充是：「舊在山東魚臺兗陽山，道光十三年魚臺人馬星恒曾移置

其家，後始歸端方。」此後的去向，王氏不曾言及，但在梁啓超的題跋中別有記敘：「石初出土藏馬氏，後爲端匱齋所得，匱齋死流出廠肆，有歐人貴樂爾者輦去矣。」交待了原石的下落。筆者不及查證梁氏所記是據親見還是耳聞，但這一記載無疑給我們留下了一條追尋的線索。

## 二、記拓本的遞藏情況

有遞藏經歷的拓本，多是漢唐古刻。梁氏的這類藏品，往往購求於當時的知名藏家。對這類拓本，梁啓超常常於題跋中記錄遞藏者，或以收藏印證其舊日藏所，如《延光殘碑》、《曹全碑》、《劉平國紀功摩崖》等題跋皆是。

## 三、校記

梁啓超作校記，方法沿襲傳統金石學的通例，考校古碑缺字之多寡，點畫之差異，以定拓本的新舊——《景君碑》、《西狹頌》、《楊淮表記》、《高貞碑》所見題跋；又以紙墨分先後——《鄆闕頌》、《魯相謁孔廟碑》、《雁塔聖教序》所見題跋。梁啓超雖然學富五車，而他於金石學稱不上窮搜博采的專家。由於經眼的古刻善本畢竟有限，所以他的校記還無力證偽，題跋中所記的幾通贗品，都是依據方若的《校碑隨筆》，而非目驗墨本甄別。

考校碑刻，梁氏時時引據金石專著，題跋中所見者，有宋趙明誠《金石錄》，洪适《隸釋》與《隸續》，王象之《輿地碑目》；明趙崡《石墨鐫華》，清翁方綱《兩漢金石記》、吳玉搢《金石存》，畢沅阮元《山左金石志》，孫星衍《寰宇訪碑錄》，方若《校碑隨筆》，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證》，端方《匱齋藏石記》，楊守敬《壬癸金石跋》以及陸氏《儀顧堂續跋》、牛氏《金石經眼錄》，凡十五種之多。由此一端卻能見出這位才子型的學者藏書的豐富，讀書的廣泛。

## 四、考釋碑刻文字

拓本的辨偽方面是梁啓超的弱項，而考釋碑刻文字，梁氏的學養則要大大優長於金石家。他讀碑很細致，常生聯想，以碑刻證文獻之不足。

《萊子侯刻石》跋云：「萊子侯當是姓名，《孟子》有萊朱<sup>(6)</sup>，豈其苗裔耶！」此刻蓋封田以贍宗族者，亦可見古誼也。」他於《劉懷民墓志》發現，「此志先銘後序」，是墓志行文體例的「別格」。對於《王僧墓志》出現的「顯祖曾祖之名皆筆迹極細，與全志不同」的筆迹現象<sup>(7)</sup>，梁啓超解釋，見於顯祖、曾祖、祖下的名諱（凡三字）。所以特異者，蓋別由一人填諱也。進而提出「碑版中填諱之例不審是否以此志爲最古」的疑問。欲把個別現象引伸爲一般問題來考察，發人所未發。又以文獻證碑刻，如《尉富娘墓志》，結合《周書·尉遲迴傳》的記載來考釋，他寫道：富娘爲尉遲俟的曾孫女，而墓志中「於姓省「遲」字僅稱「尉」，而尉遲俟兜，「於名省「俟」字僅稱「兜」，殊爲奇異。」提示墓志與文獻記載的差異，爲考察姓氏的流變（省稱）提供了實物證據。梁氏的這類考釋性題跋，遠比他校記有學術的價值。

## 五、題署碑刻名稱、年代

如《劉梁殘碑》、《正直殘碑》、《元孫等字殘石》、《吹角壘刻石》及《鄧太尉祠碑》，所題文字皆此類，十分簡單。

## 六、訂誤、存疑

梁啓超讀碑，對前人所記並非盡信，前人所誤，亦有訂正。《劉忻墓志跋》云：「石曾藏端午橋家，《匱齋藏石記》所謂《中堅將軍張忻志》者是也。但細繹志辭，無張氏故實，想匱齋粗心誤題耳。」《樊可憒造像跋》是其存疑的一例，跋云：「藝風堂藏造像最富，此片亦未見著隸。何年出土？石藏何處？當訪之。《校碑隨筆》亦無著錄。」梁氏的懷疑大有道理，只是未敢輕易斷爲贗品。此造像記有北魏正光三年款識，正書，十二行，實是偽刻。

## 七、記事叙見聞

題寫跋語時，梁啓超偶爾乘着興致記下他當日讀碑題跋的一些生動情形。如：1925年立春後二日，將《孔彪碑》碑文抄錄一過；1925年春節，閑暇無事，在飲冰室「點檢舊藏以自怡悅，摩挲不已」<sup>(8)</sup>；五十三歲

生日那一天（乙丑年正月二十六日），與其弟仲策共檢碑刻拓本，「摩挲竟日」<sup>⑨</sup>以及1923年在「半醉」的狀態下題寫《馬鳴寺根法師碑》。這些事情盡管屬於細微末節，對我們研究梁啓超晚年的生活狀態卻是十分難得的資料。

題跋中，也記下當時有關碑刻拓本的見聞。《崔頤墓志跋》記1920年「有以整張《崔頤志》求售者，索直逾百金」及《董美人墓志》「原石拓值甚昂」等事。又《瘞鶴銘跋》記該石捶拓之法，現在已鮮為人知，不妨逐錄全跋，云：「凡碑版皆尊舊拓，獨《瘞鶴銘》不然。水拓本當埃及冬潮落，刮剔泥，偃卧仰拓。雖有良工不易運技。今佳本在人間者，既若星鳳矣。陳恪勤曳石出水後，翁覃溪得其初拓本，謂經人鑄鑿，神理全失，嘆為神物之厄，反不如囊在水中得完其璞。寶則安有此，蓋石本摩崖，凹凸不剪，布紙著墨，豪釐不忒，遂成巨繆。工之不藏石，奚病焉。寺僧鶴洲初用日本雁皮紙，零拓法，其技之神，世多知之。彼嘗為人言，每拓一本，必新有所心得。蓋於堅頑漶漫中玩其體勢，若以無厚人有間，故積久而化神也。余以乙卯五月游焦山，獲此本，實鶴洲最近拓成者。鶴洲年既七十有六矣，今方卧病，苟其不起，此本即其最後所作。雖謂出水後第一精本焉可耳。」而梁啓超與寺僧鶴洲的金石緣份，近乎趙孟頫之於獨孤僧，也是一段佳話。

梁啓超在《元景造像殘石跋》中所敘該石訪得之初的遭遇曰：「養庵為言，石質粗松，再歷年歲，慮更剥泐，頗聞近官斯土者，曾僱惡工狂拓數千通以為市，恐非久且成沒字碑矣。今天讀來，不失為一則石墨掌故。」

## 八、品評書法

涉及這方面內容的題跋，梁啓超先後寫有五十餘則，其中四十五則寫於1925年（乙丑）五十三歲生日前後。

論及書法的題跋，兩漢碑刻七則，三國魏摩崖一則，南朝碑刻一則，北朝碑志造像三十二則（北魏二十三，東魏五，北齊四），隋朝碑志八則，

唐朝碑志刻帖五則。不難發現，梁啓超品評的重點所在，是北朝時期的北魏碑志。

品評書法，書體的蛻變是梁啓超讀碑時關注的焦點。在漢碑的題跋中他每每提到「此刻足徵篆隸蛻變之迹」<sup>⑩</sup>，「欲觀篆隸蛻變消息，當於此碑求之」<sup>⑪</sup>。他說：「東京中葉，書勢為篆隸蛻變之期，《延光殘碑》、《祀三公山碑》及嵩山三石闕，歷歷可按」<sup>⑫</sup>。梁啓超在東漢碑刻中檢索篆書向隸書過渡的蹤跡，與業師康有為同出一轍，《廣藝舟雙楫》云：「若《三公山碑》、《是吾碑》，皆由篆變隸，篆多隸少者。」「隸」由「篆」生，西晉衛恒《四體書勢》早已明言，其嬗變之迹的可靠實物證據，是本世紀以來相繼出土的一批漢簡、秦簡遺物，證實篆書衍生隸書在西漢前期即告完成。康梁不及親見，囿於東漢碑刻尋覓篆隸蛻變之迹的消息，不免發生誤差。梁啓超目為篆隸蛻變之迹的東漢碑刻不過是隸書時代的書法家「以隸筆作篆」的作品而已。

對於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摩崖、碑志、造像記所見書體的嬗變，南北方書風的差異，梁啓超服膺阮元（文達）「南北書派論」。而於北朝尤其是北魏書風的流變，梁啓超則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元景造像記》跋云：「北朝一切文物，皆以太和間（477—499）為全盛，其書由八分蛻入今楷，痕迹盡化而神理固在，天骨開張，光芒閃溢。神龜（518—519）正光（520—524）以後，諸作雖有其風格，已遜其氣魄，俯視齊隋，益等自鄙矣。」《鄭道忠墓志跋》云：「神龜正光間為魏書全盛時代，諸體雜出而皆軌於正，各極其勝。魏分東西後，奇袤漸作，北齊北周益橫決矣。」《惠猛墓志》跋曰：「元魏之書自太和迄孝昌（525—527）間，真如千巖競秀，萬壑爭流，殊不能以一家一派量度其價值也。」

從書法體貌而言，梁啓超認為「方嚴峻拔」是「盛魏正宗」<sup>⑬</sup>。正宗之外，也有別調，如《石門銘》之類，梁啓超的看法是：「《石門銘》筆意多與《石門頌》相近，彼以草作隸，此以草作楷，皆逸品也。吾鄉鄧鐵香鴻臚一生專學《石門銘》，然終未能得其飄逸，南海先生早年亦然。」